

生产

第9辑

PRODUCING

封面人物: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

专题 意大利差异 [意]安东尼·奈格里

人物 诗意电影 [意]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评论 “宣言派”与意大利新左翼思潮 黄晓武

艺术 历史情节中的徘徊: 评高世强的录像作品

[德]乌苏拉·潘汉斯-比勒

《资本论》的革命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意大利差异

主编 汪民安 郭晓彦

江苏人民出版社

MSMS

民生美术馆
MIN SHENG MUSEU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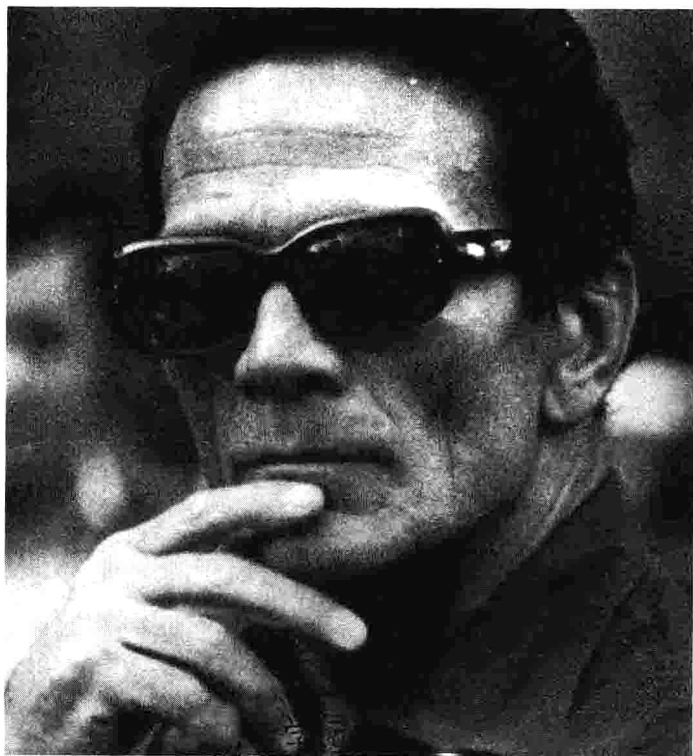
THE INSTITUTE

民生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生产

第9辑

PRODUCING



意大利差异

主编 汪民安 郭晓彦

江苏人民出版社

MSMS
民生美术馆
MIN SHENG MUSEUM

THE INSTITUTE
民生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 第9辑/汪民安, 郭晓彦主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214-12754-9

I. ①生… II. ①汪…②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755 号

生产 第9辑

主 编 汪民安 郭晓彦
责任编辑 朱晓莹
责任编辑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2754-9
定 价 3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专题：意大利差异

- 意大利差异 [意] 安东尼·奈格里 3
- 《褻渎》节选：K [意] 吉奥乔·阿甘本 11
- 哲学与语言学 [意] 吉奥乔·阿甘本 23
- 两篇文字中的实在论 [意] 吉亚尼·瓦蒂莫 36
- 生命政治 [意] 罗伯托·埃斯波西多 41
- 共同体与虚无主义 [意] 罗伯托·埃斯波西多 64
- 超越虚无主义：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哲学中左派海德格尔主义批判提纲
[意] 马泰奥·曼达里尼 76
- 关系的伦理学 [意] 阿德里阿诺·法布里斯 94
- 关于诸众与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十个论点 [意] 保罗·维尔诺 104
- 技术时代的人 [意] 安伯托·加林贝蒂 116
-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意] 诺伯托·博比奥 131
- 意大利福利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及其意义 [意] 卡洛·韦尔切洛内 145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需要知道的若干问题
[意] 罗珊娜·罗桑达 157

人物: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 电影剧本:“要成为另一结构的结构” [意]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173
- 诗意电影 [意]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181
- 关于现实的书写语言 [意]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198
- 费里尼的天主教非理性主义 [意]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220
- 电影与理论:帕索里尼访谈录 [意]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230
- 论帕索里尼以及新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 [意]安德烈亚·里吉 237

评论

- “宣言派”与意大利新左翼思潮 黄晓武 271

艺术

- 历史情节中的徘徊:评高世强的录像作品 [德]乌苏拉·潘汉斯-比勒 287

文献

- 反《资本论》的革命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297

专 题：意大利差异

- ◇ 意大利差异
- ◇ 《褻渎》节选:K
- ◇ 哲学与语言学
- ◇ 两篇文字中的实在论
- ◇ 生命政治
- ◇ 共同体与虚无主义
- ◇ 超越虚无主义: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哲学中左派海德格尔主义批判提纲
- ◇ 关系的伦理学
- ◇ 关于诸众与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十个论点
- ◇ 技术时代的人
- ◇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 ◇ 意大利福利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及其意义
-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需要知道的若干问题

意大利差异

[意]安东尼·奈格里/文 王行坤/译

当我们说“哲学”时，我们指的是一种批判性活动，这种活动让我们可以抓住时间，并调整自己与时间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一个共同的命运，并为了这个目的去认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跟随秦梯利^①与克罗齐，去如此认识哲学的话，那么可以说，20世纪的意大利还没有这样的哲学。当然，也存在一些关键的例外（准确地说，是三个例外）。

在考察这些例外之前，让我们看看20世纪意大利哲学在国内和欧洲语境中的发展。19世纪意大利哲学中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人物：里奥帕蒂（Leopardi），罗斯米尼（Rosmini），德桑蒂斯（De Sanctis），拉布利奥拉（Labriola）……但是，这些只是个人，没有形成学派，因为“意大利没有中心”，在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交流是碎片化的，这就妨碍了公共领域的形成。黑格尔说过，德国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庙宇，里奥帕蒂前面的话就说明，意大利不存在公共空间——没有一个主导性的中心，只是存在交流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因此，19世纪意大利哲学的辉煌并没有在20世纪延续下去。哲学并没有超越意大利统一（Risorgimento）^②。大学的繁荣，时尚的喧嚣，以及新媒体工具的轻薄：这些都在时代的节点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创造并传播教条的哲学观念，宗派观点或文学呓语。但是，如果意大利没有中心的话，意大利哲学甚至都不是地方性的：它是一种虚弱的（weak, debole），过于虚弱的哲学，无论是在政治或老板面前，还是在独裁者或教皇面前。

在20世纪观念和讨论的衰败中，当有些人骄傲地宣称当代哲学“虚弱”的时候，最为可怕的时刻到来了。其他人有一个更为合适的说法：“瘸腿的哲学”（limp thought, pensiero molle）。看起来这是在温热的意大利天空下，去适应后现代空气的

① 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曾经自称为“法西斯主义哲学家”。主要作品为 *The Theory of Mind as Pure ACT*, *The Reform of Education*。——译注

② 19至20世纪初期间，将意大利半岛内各个国家或分裂的政权统一为意大利的政治及社会过程。——译注

尝试:事实上,这是想要将真实(real)的阐释和表面的丰富性,以及法国后结构主义批判的装置和布局,转移到海德格尔式本体论的空间。更具欺骗性的是,这是否认起义与反抗历史的计划,这些起义与反抗伴随意大利自下而上的对公共空间的建构,这是自法西斯主义以来的第一次民主建构。1968年之后,斗争与政治话语的新的大众化力量^①需要小心翼翼的、约束在法西斯主义更新了的(但非常粗糙的)本体论之中。这种虚弱的思想将福柯和德勒兹塑造沙龙女主人的形象;让他们在所谓的“左派”报纸的版面上翩翩起舞,尤其是《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②……我们收到一个特殊的药方:劳动的新构成,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智识劳动(intellectual labor),对我们来说,都表现为难以把握的和偶然的。其创造性在“历史的终结”这种虚幻的修辞中被神秘化,后者本来意味着雇佣劳动和工人阶级的消失。伴随着工业计划的改变以及劳动力转变的悲剧,被带回、并定格在假想的共产主义的失败,以及预想的“畅饮吧米兰”(Milano da bere)^③的胜利的混乱中。瘸腿的思想与克拉克西(Craxi)^④时代并肩而行;但是我们得承认,克拉克西的普鲁东主义无论如何,都比瓦迪莫(Vattimo)^⑤或法拉拉(Ferrara)^⑥轻飘飘的思想要更加重要,在哲学上更具相关性。

从右翼来说,保守主义不可理喻的文化版面甚至认为这种瘸腿的思想太过伤风败俗: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⑦公司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长久以来,翻阅《晚邮报》的文化版面就像是观察下萨克森^⑧的老处女的疾病,或者更糟糕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小型社区的不幸。与瘸腿思想的未被污染的流动与轻盈相比,多瑙河将自己呈现为胶着的、沉重的河流。这对多瑙河来说太糟糕了,本不该如此!真是太糟糕了:为那种没能阻挡纳粹的思想而哀悼,事实上并不能取消历史过程中的力量(像中欧糊涂的导师所热切希望地那样)去打败纳粹主义。这是集体的,共产主义,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主义的力量!中欧也是反抗。

这是上世纪90年代直到当下,左右翼之间的意大利哲学的基本情况。在1989年之后,这些文化版面也会偶尔登载那些为反动派辩护的东西,还有那些历史学家(虽然他们自吹自擂是德罗伊森^⑨或布罗代尔的学生,其实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

①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力量(power)这个词译自potenza。——英译者注

② 意大利新一代的代表性报纸,开本略小,彩色印刷,现在每天56版,各地还有地方版,2005年2月资料显示日平均发行量60.6万份。总部在罗马,有编辑记者350人。——译注

③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畅饮吧米兰”是流行酒饮料的广告词。这样一个广告词彰显了米兰作为时尚、媒体和荣耀之都的世俗维度。——英译者注

④ 1983—1987年任意大利总理。——译注

⑤ Gianni Vattimo,意大利哲学家。——译注

⑥ Alessandro Ferrara,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译注

⑦ Claudio Magris,意大利作家。

⑧ 德国城市。——译注

⑨ 德罗伊森(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知识理论》。

们宣称修正主义有权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这些文化版面偶尔也会登载新超验主义(neo-transcendentalist)的东西。我们的知识界也欢迎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因为他们表明,人年轻时很激进,而年长时也可以很反动……

为什么意大利哲学文化,以及表现这种文化的文化版及其所涵养的思想性,重复了卡拉(Raffaella Carra)^①电视节目的闪亮之处?这个故事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瘸腿哲学的,文化传播中堕落的)中心是自从法西斯主义以来,这个美丽国度(Bel Paese)^②所拥有的唯一中心。

停。让我们看看那三个例外。首当其冲的是葛兰西:驼背,斯大林主义的背叛者,其他政治犯在狱中曾用石头对其进行质问。葛兰西在合适的地方重新确立了哲学——普通人的生活和斗争中。他重新发现了秦梯利,将实现主义(actualism)转化为思想和未来实践的基础(虽然我们得承认,这种尝试有些牵强)。这并非一个让人心情愉快的冒险:一个左派,一个共产主义者重新梳理秦梯利的哲学,部分还停留在19世纪……葛兰西就是这样一个人,因此他代表了意大利统一在20世纪意大利的延续。不幸的是,陶里亚蒂蹩脚的模仿者的非哲学(也就是,在当下左派中大肆泛滥的令人恐怖的犬儒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者的消灭他人的快感(在其反对70年代的运动中,得到了完全的表现,当下依然存在,依旧狂热),将这个可怜的革命声音隐藏起来,并将其神秘化了。对不起,不只是革命的,还有生动的,智慧的和慷慨的声音。在反对死亡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中,总是存在某种创造性的力量。这正是他们(老板,权力精英)所拒绝的。葛兰西的例外就成为一种经验,扎根过去,也许只能描绘出一个乌托邦的未来: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断裂,一种反抗。

还剩下两个例外,两个根本性的断裂,不只打断了19、20世纪意大利哲学史的连续性,同时,也打破了意大利社会中智识生活的物质织体和政治—语言结构。这两个例外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否能够让我们宣称,这个让我们为新千年(2000年)作好准备的漫长时间,具有建设性、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因素,代表了我们可以依赖的力量?让我们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意大利在20世纪所见证的第一个例外,第一个能够进入现实,并且抓住意大利统一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起源的力量的,就是工人主义(workerism)^③,这来自于特龙蒂(Mario Tronti)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个例外,与工人主义同时,几乎被埋没但却非常重要:这就是穆拉诺(Luisa Muraro)所发展的女性主义的差异思想。这些是20世纪意

① 意大利受欢迎的电视主持人。——英译者注

② 对意大利的一种古典诗意美称。但丁和彼特拉克曾经在文学作品中用到这一表达。——译注

③ 意大利自主主义袭自特龙蒂的工人主义,代表人物众多,如奈格里、拉扎拉脱(Maurizio Lazzarato)和维尔诺(Paolo Virno)等,其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译注

大利本体论中仅有的两个理论创新。两者都从剥削构成以及人压迫人、男人压迫女人的根本形式出发。因此,存在两种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的和父权制的。哲学思想只能从此出发,并在此栖身,关注再生产的生命政治主题。我们因此处于哲学反思中后现代主义形象的中心。当亚里士多德主义从整体下降到个体,再(通过因果模式)由个体上升到太一(One),后现代并不认为“上升道路”或者“下降道路”是系谱学的和生产性的;它甚至也不接受个体性,只接受独一性(singularity):因此它将差异视为创造性的抵偿物(quid),在自然和历史之间伸缩。差异的工人主义和女性主义于60年代出现,其契机是斗争的巨大发展;在这些斗争中,不可抹平的差异出现了,正如在工人对抗雇佣劳动的斗争中,以及女性反对家长制统治的斗争中,所出现的新的主体性。正是这些差异的发现,决定了哲学的重生。反抗产生了哲学。

在认识了各个例外的产生过程后,让我们看看这些哲学的共同之处。首先这两者的立场都反对辩证法。再没有什么合题或扬弃。龙齐(Carla Lonzi)曾说:让我们唾弃黑格尔吧。罗莎(Alberto Asor Rosa)补充说,对于那些不懂如何发展阶级斗争之间关联的叙事,我们立刻与之断绝关系。当辩证法傲慢地宣称一切都要归于太一的时候,这里每个事物都固定在二和多的位置上,并没有综合(合题)。

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绝对精神,就像用项圈遛狗一样,在历史的道路上漫步。再没有目的论。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可以改变事物的要素。

第二个共同之处是两个立场都发展了差异的现象学,都努力去进行阐释。于是,对两者来说,颠覆人类境况的实践首先被推向了分裂主义。“没有同盟军的工人阶级”:工人主义宣传语如此呐喊。女性反抗家长制统治的资产阶级制度:这就是最初的差异的女性主义意识进行组织的方式。

坚持这两种让我们颇感兴趣的哲学的第一个共同特征,非常重要:很明显,这个共同特征就其自身内容来看,是完全难以识别的和形式的(绝非偶然的是,这两个立场经常相互冲突,工资制度所导致的家长制的行为,也会发生在无产阶级家庭)。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坚持差异的分离的过程,会产生另一个更深邃的通道——同时属于这两个立场的本体论转向——的时候,这个共同的特征就不再是难以识别或形式的了。一个创造性的休止。

但是,有些人会叫嚷说,这些身体和思想的历险在1968年,全世界都很普遍:为什么要强调其意大利特性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给出答案。第一个来自于文化的视角。在意大利的荒漠中,与其他北约国家不同的是,在这个缺乏中心的国家中,诸差异哲学以更加纯粹的形式得到发展,不需要通过先前存在的范式去表达自己。这些运动构成了真正的文化和语言学的时代。并没有太多东西能够反对这些,除了宰制关系的各种模式:工业秩序里

的企业主义(corporatist)理论和实践,以及好的家庭生活中的天主教规范。因此,正是在这个荒漠中,这些新生的,生机勃勃的花朵被孕育出来;正是在与被抛弃的领域的对比中,在他们外来的、能力强大的表达中,哲学反抗和肯定的新形式得以出现。

另外还有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动态的因素需要强调。这些哲学“差异”第一次在生命政治领域中得以呈现(也就是说,它们开始彰显生命自身所具有的直接的政治意义)。现在,这个因差异而产生的直接的生命政治张力开始繁衍,开始生产出新的要素。在极短的时间内,意大利从对差异的分裂主义肯定,转向了其构建性的肯定。事实上,关于差异的各种理论并非简单地代表了对压迫和压迫者的反抗;它们并没有滞留在防御性的位置,而是成为生产性的反抗力量;它们表面是多元的游击队运动。这里不再存在一个简单的理论,而是转变性的实践。那些内嵌在社会交往节点内的实践,以微观政治的形式威胁到了资本主义和家长制统治的主导要素,在知识与大学,工厂与劳动场所,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发动突袭。从这两个立场的视角来看(二者理论上的界限泾渭分明,但在政治上却常有重合),分裂成了某种创造性差异。在意大利,这种转变先于以其他方式在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变化。

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个真正的休止,一个断裂,一个本体论事件。在这个从分裂到创造性差异、从反抗到出走(exodus)^①的普遍转变中,工人与/或女性的运动与意识克服了对现存事物进行批判(这是现时代的组织理论中的一个经典主题)这一主题,代之以新的变化。这是一种由诸众(multitude)发动的,内在的、集体的改造或转变,既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伦理性的。这是摆脱现存事物和一切统治的出走。这个事件成为1968年之后20年以来的主导特征,并且将不断深化运动的颠覆性力量。

这里我们可以回应之前的反对意见:与其源头即关于差异的后结构主义概念——例如,在法国是在梅洛-庞蒂、福柯与德勒兹之间,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与伊利格瑞之间而得到构建——相比,意大利反抗的无产阶级和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差异,到底有何不同,到底有多么强大?当然,存在很多亲缘关系,但是亲缘并不意味着任何从属关系,因为甚至在这些立场源自法国理论的情况下,它们也可以继续生存,并在野外的环境中欣欣向荣。它们是丛林的产物……事实上,从最初来看,当差异的诸概念发展为分裂主义时,它们来自从本体论的不可化约的要素(ontological irreducible)——这种要素是直接性的,在斗争中形成,在连续性中得到建构。另一方面,法国哲学在其旅程的终点,只抵达了这种本体论的不可化约要素(不论是“没有器官的身体”还是“主体性的生产”)。另外,当涉及从这个新发现的领域中构建新的地平线时,

^① 这也是意大利自主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策略性地避开正面阶级斗争,从劳动场所撤离,从而使其瘫痪的斗争方法。——译注

法国哲学最多也就表达出了某种希望,构建了某些假设,并没有生产出生命的经验和实验,并没有启动出走行为。在意大利,差异的生命政治在伦理—实践领域得到了探索,而这些实践注视着**未来**(to-come, a-venire)。在压迫和黑暗中,在 70、80 年代用荒诞的骷髅地来代表运动的时候,一道新的光芒从天而降。

创造性差异的思想也用来反对后现代主义哲学。那个业已完成的,无关紧要的(被资本所吸纳的)世界是后现代哲学得以流行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一切可能的批判空间都搬到了外部,搬到了边缘。在世界的褶皱或极限中,或者动物生命(zoe)反对人类生命(bios)^①的地方:这是荒漠,也许只有在这里,反抗还可能——这就是后现代哲学家的信仰。现在,差异的实践反对并且拒绝后现代主义的构建,预见到对基于肯定差异的再建构的期望。事实是,**差异就是反抗**。这里所开始的差异就意味着系统中心的断裂,在这样一个中心中,社会劳动被吸纳入资本,在再生产的秩序中,在女性从属家长制的普遍真理中,产生了对统治的反抗,而且这种反抗不是来自于边缘,而是来自于中心。或者说,这种反抗重构了一个中心,一个可以作为杠杆的支点,在体制的中心对现实进行改造。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差异,一次激烈的、激进的出走。

在超越文化版面和学术界,重新激活意大利哲学场景的时候,这些差异的立场在全球范围,成为新哲学的种子。正如在先知时代,哲学家需要穿过荒漠,去传达自己的思想。先知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忽视,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会有人聆听。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差异发展成为智识性的力量,并且开启了劳动的新概念和价值生产的新形式。面对这种新现实的时候,资本主义权力^②的结构也需要更新;这就是我们所见证的,权力的全球组织所经历的大变动的原因所在。从这种无产阶级差异开始,解放的历史运动的新的主体自身就构成了自身,正如那些由无限的独一性所构成的诸众,他们不会再次臣服于主权的统治。

而且,是女性主义差异最终置身于这场对哲学地形进行彻底改造的中心位置,因为它已经成为生命政治力量的代表,并且构成了对社会关系的真正生产。这里存在创造性的第二层次,这是斯宾诺莎在将情感性力量推向存在的创造性条件的时候,将身体性的**欲望**(*cupiditas*)推向本体论的**爱**(*amor*)的时候所指认的,这些在女性主义差异中得到表现:我们梳理的是创造性的第二层次,它整合并成全了第一个差异,也就是劳动的差异,将其表现为由身体和整个社会整体所拥有的,原初的与普遍的进行转变的能力。系谱学包纳并且升华了社会劳动。

注意,特龙蒂或者穆拉诺不再引导这场革命。就像一切伟大的作家那样,他们没

①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这样的区分。——译注

② 虽然权力和力量所对应的英文都是 power,但是对应的意大利文却有所不同(前者为 *potere*,后者为 *potenza*),我们会根据上下文意思,区分权力和力量。——译注

有形成学派,而是属于在更广大舞台上运作的谱系。差异的形式、模式、内容和角度离开了讲座和工作场所的世界:他们在当下进行运作,在运动和生产合作的新的社会网络中得到发展和再造。差异不再是分裂:它成为创造性的,并且开始创造未来。出走成为主导行动模式。

我们应该骄傲,因为这就发生在意大利的荒漠中。也许,当下新的反抗和新鲜血液已经有了它们自己的圣殿。

我在重读我的文本。我感觉,自己很幼稚地屈服于某种傲慢(*hubris*),不愿去考虑(如新天使^①所做的那样)毁灭和死亡的现实,这种现实依然在我们身后紧追不舍——或许,我也没有接受那些伴随我们的遗憾。但真的是风暴在驱使我们吗?难道,不正是我们存在的悲剧,构成了主体性的不确定以及未来的风险?不正是我们自身存在的不可否认的悲剧,在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成为某种短视和不可忍受的疲倦,而非先于我们就存在的失败感和强烈的未完成感?难道我们不能用欲望去反对傲慢吗?德勒兹曾说过:“我永远也不想成为被哲学史所阉割的思想家。”我给出另外一个说法:我不希望被过去所阉割,我就是这种过去的历史目的论的产物。但是,差异和事件感,还有构成未来的对独一性的感知,能否将我从噩梦中拯救出来?这个疑问丝毫不弱于那个经典的、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问题,我们不得不忍受其现代性背景下,狂暴的理性主义装置(*dispositif*)。在理性的悲观主义背景下,我们怎样才能够让新天使往前看,去解决其与历史立约所结下的债务,去克服过去的约束?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将自己呈现为创造性的差异是一个通道,借此可以将噩梦转变成美梦,将美梦转化为生命的筹划(当然完全意识到其中的苦难和制约要素)。如果差异就是反抗,那么美梦就可以以完全清楚的形式,进行自己的历史筹划。如果差异是一种生命模式,那么生命模式就是创造性的。这里,没有人质疑批判性和超越性的行动;但我们会可怜它,在引发这种行动的激进的困惑中理解它,这种困惑并不允许它去自然和暂时的差异中扎根:也就是权力的差异。事实上,在创造性差异的理论中,存在某种极其强烈的回到起源的冲动,这种冲动并没有被噩梦和压迫性的暴力所拖累。这并非幻象,而是至关重要的要素。当差异自身与(被过去所拖累的)起源相认同时,它就无法成为创造性的,而当它与那种历久弥新的力量相混同,并向未来开放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差异破坏了每一个具有规定性的本体论基础,因为它就是对自由本体论的创造性的规定。

不,无论是胡塞尔,秦梯利还是柏格森,他们都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支持者是现存思想的奇特的、艰难的实证性,这种思想是内在主义(*immanentist*)和唯物主义

① 指保罗克利的 *Angelus Novus*, 相关讨论见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译注

的,也是我们这里讨论过的。在 20 世纪的意大利,这种思想以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名字表现出来。我们因此拥有一个悖论性的差异,能够一点一点地、肯定性地生产出整体。这种差异知道如何发展成一个网络,从内部到外部,从独一性壮大为共同性(the common),不借助连续性的策略,而且反之亦然。它知道如何成为传奇(在毁灭该死的历史之后)。我们带着敬意提及新天使的故事,并且跟着差异实践的节奏,请求他向前看。“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可能,就像另外一个(差异的)地方在我们意大利诸行省中还有可能一样。

《褻渎》节选：K

[意]吉奥乔·阿甘本/文 黄晓武/译

诬陷者

1. 在罗马的诉讼中,公诉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对司法系统来说,诬陷代表了一种巨大的威胁,以至于诬陷者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在他的额头刻上大写字母K(拉丁文“诬陷者”[kalumniator]的首字母)。戴维·斯蒂米利指出了这一点在解释卡夫卡的小说《诉讼》中的重要性,小说一开始就确定无疑地表示这是一起恶意诬陷案(“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因为一天早晨他没干什么坏事就被捕了”^①)。斯蒂米利提醒我们,卡夫卡在准备从事法律职业时研究过罗马法律史,他认为,K代表的不是“卡夫卡”,而是诬陷(这一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斯·布罗德)。

2. 诬陷是整部小说的关键——它可能也是整个卡夫卡世界的关键,它深深地烙上了法的神秘力量的印记——如果我们注意到以下这一点,它无疑将更具启发性:当字母K不再仅仅指诬陷(kalumniā),而是指诬陷者(kalumniator),这只能意味着诬陷者成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他发起了一场针对自己的诉讼。“有人”用诬陷的方式发起了这场诉讼,这个人就是约瑟夫·K自己。

这无疑就是对这部小说的仔细阅读展现给我们的。即使一开始K就知道,没有办法确定他是否被控告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被人控告了。”监察员在他们第一次会面中这样告诉K^②),并且他的“被逮捕”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影响,但他仍然想方设法刺探法院各个办公室的情况(它们实际上不过是阁楼、储藏室和洗衣房,

① [奥地利]卡夫卡:《诉讼》,张荣昌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页。

② “我压根儿不能告诉您,说是您被人控告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被人控告了。”见上书,第10页。

只是在他的审视下才变成了法庭),并鼓动连法官们都似乎不太感兴趣的一起诉讼案。这甚至不是一起真正的诉讼,它只有在 K 认为存在时才存在,这是 K 自己在第一次审讯中急于向预审法官承认的。然而,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给了法庭,即使法庭还没有被召集起来,正是在这一刻,他毫无必要地承认自己被人控告了。同样,在与比尔斯特纳小姐的谈话中,他也毫不犹豫地向她建议,应当诬陷他冒犯了她(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诬陷者)。最后,监狱牧师在大教堂中作为与他的长谈的结束语告诉他:“法院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你来它就接待你,你走它就让你走。”^①换句话说,“法院不控告你,它只是收集你提起的针对自己的各项控诉。”

3. 每个人都提起了一场针对自己的诬陷案。这是卡夫卡的出发点。因此,他的世界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喜剧性的:罪行并不存在——或者说,罪行不过是自我诬陷,即用莫须有的罪名来控告自己(也就是说,用自己的清白来控告自己,这是最具喜剧性的姿态)。

这和卡夫卡在别的地方阐述过的原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原罪,人类犯下的古老的过失,是由他不停地提起的控诉构成的:他遭受了不公,他承受了原罪。”^②就诬陷案而言,罪行并不是控诉的缘故,而是控诉本身。

事实上,诬陷只是在诬陷者确信被告是清白的这一情况下才发生,只有在他提起诉讼却不伴随相应的确定的罪行的情况下才发生。在自我诬陷案中,这一罪行既是必须的,又是不可能的。被告既然是一个自我诬陷者,他就完全清楚自己的清白,但既然对自己提起了诉讼,他同样也明白自己犯有诬陷罪,应当得到惩罚。这就是卡夫卡境遇的绝佳写照。但是为什么 K——每个人——要诬陷自己呢?

4. 罗马法学家把诬陷视作一种误入歧途的控诉(他们使用的是“轻率”[temeritas]一词,来源于 temere,即“盲目地、随意地”,后者在词源上和意大利语中的“黑暗”[tenebra]有关)。蒙森注意到,动词控诉(accusare)似乎并不来源于法律专业术语,在最古老的一些证明材料(比如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作品)中,它是在伦理而不是在法律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正是由于它在法的领域中的微不足道,控诉才显示出了它的绝对重要性。

罗马诉讼是以递交诉讼名单(nominis delatio)开始的,即在控诉人的要求下,把被告的名字刻写在被告人名单上。控诉(accusare)从词源上来源于 causa,意思是“提起诉讼”(chiamare in causa)。从某种程度上说,causa 是最基本的法律术语,因为它命名的是已经包含在法的领域中的事物(正如 res 意指的是已经包含在语言学领域中的事

① “我压根儿不能告诉您,说是您被人控告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被人控告了。”见上书,第 183 页。

② Franz Kafka,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nd Other Pieces*, trans. W. Muir and E. Muir (London: M. Secker, 1933), 245 - 246.